

□ 应望江

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波浪式发展的理论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发展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大政策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一个有机的逻辑整体,我们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发展理论,不应摘章寻句、片言只字地去理解,而应从总体上、从精神实质上、从战略高度上去把握和领会。然而,邓小平发展理论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论述,谈谈个人的学习体会。

一、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

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有着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更有着领导和管理国家经济建设的卓越才能。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担任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形成了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去标索本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显著风格。他在总结我国4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时精辟地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①。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经济波浪式前进,是指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即一国的经济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增长后,达到一个最高点(波峰),紧接着是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跌落至最低点(波谷),然后又通过快速增长开始回升,达到另一个最高点(波峰),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波浪式前进的态势。依据对经济波动性发展规律的思考,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②。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后,就需要进行调整,使经济比例关系得以协调;调整的的目的是为了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经济增长总是有波动的,不可能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而所谓经济稳定和协调,只不过是增长过程的波动幅度较小、波动频率较低罢了。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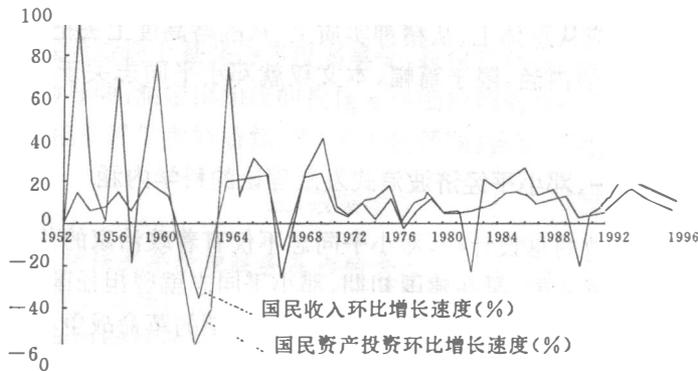
二、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的实证分析

邓小平同志以精练通俗的语言,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史,我们就可以不难认识邓小平同志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这就是,不仅是中国经济,而且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都是波浪式前进的。国内外大量经济学家长期醉心于经济增长趋势的研究,从各个角度验证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存在,如按一个循环周期的长短(波长)分,就有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的平均长度为9—10年的“中波”之说,美国经济学家基钦的平均长度为40个月的“短波”之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的平均长度为50年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平均长度为20年的“长波”之说,等等。

从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种观点看,世界经济增长大体17年左右完成一次循环,每个循环都以“三级跳”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经济增长以释放能量为主的时候,经济发展便趋于上升,到一定程度又会因积聚能量表现为下降,而后再上升。从1960—1975、1975—1991这两个周期中,都可看到这种“三级跳”的态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对1993—1995、1994—1996两个阶段的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预测在1997—1998世界经济将形成一个增长低谷,完成1991—2007这一周期的第一跳,尔后又分别于2003、2007年完成第二跳和第三跳^④。

如果我们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国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数及增长速度值逐年排列下来,并在坐标系中绘出相应的曲线,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波动性(见下图)^⑤。



中国国民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曲线图

与世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相适应,上海的经济也是波浪式增长的,只不过平均波长略有不同。上海的经济增长表现为15年左右完成一次周期性的波动。在1961—1975、1975—1989期间,上海的GDP增长同样呈“三级跳”的表现形式。以1975—1989这次波动为例,经过1975年和1976年2年的徘徊,从1977年至1980年,GDP连续4年冒高,完成第一跳;经过1981年的回落,从1982年至1985年,GDP再次连续4年冒高,完成第二跳;又经过1986年的回落,在1987—1988年间又连续2年冒高,从而完成第三跳后进入低谷^⑥。

三、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的规范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都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因而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论述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产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探究中进一步加深认识。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不相容或不协调。这种不相容或不协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

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通过经济危机来实现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出现的各种矛盾的自我调节。只要基本矛盾没有消除,调节的功效便不会持久,因而使经济危机的出现有了周期性。

当然,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其矛盾发展会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如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周期的阶段性已不明显,危机中那种对社会生产力的浪费和破坏也没原先严重;二是周期的波幅已明显减弱。究其原因,主要是:(1)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经济主体的形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有所缓解;(2)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使其能够较为合理地配置国内资源和尽可能地利用国外资源,来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3)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干预,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善;(4)近几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崇“零增长理论”,在这种经济理论指导下,一方面减弱了经济的震荡,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再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有所收敛^⑦。

但这并没有改变经济波动式发展的性质。正如《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承认的那样,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在近 6 年内稳定在 2—2.5% 这样一个波动不大的幅度内,这说明当今市场的调整能力比过去更强了,但这并没有防止房地产过热、从计算机芯片到电话线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时出现过剩,考虑欠周的兼并和收购、花费巨大的银行贷款方式以及证券市场投机性大幅度摆动等周期现象的发生。正是繁荣时的盲目乐观和萧条时的惶恐不安的这种本能,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可能寿终正寝^⑧。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所有,国家就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需求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因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将会消失,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再表现为周期性的波动。然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仅仅是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只不过是前提条件,而必要条件是能否做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我国来说,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还做不到,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简要分析如下:(1)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我国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表面上已消除,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除。无论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或是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再生产活动在由国家或政府的计划安排下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还达不到使国家计划能够包容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并适应市场的千变万化。(2)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在我国虽已不存在,但作为导致经济波动直接动因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并没有消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短缺经济,一方面是社会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是社会供给总是相对不足。平衡二者的办法不是增加供给就是压缩需求,在压缩需求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问题。增加供给即意味着增加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时滞性,增加投资首先带来的不是供给的增加,而是需求的扩大,这反而更加重了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供给与需求的这种逆向运动的结果最终是把经济推向高潮。一旦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达到不能相容的程度,就需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于是经济便进入低潮,开始一个新的波动周期。

因此,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由供给与需求的

矛盾引发,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没有必然的联系。制度的不同只能使波动在阶段表现、作用范围、振荡程度、时间间隔等方面有所差别。

四、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的指导意义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因而,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把握经济运行的脉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调控宏观经济,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认识和掌握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学习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我们认识到,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一种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我们搞经济建设只求毫无波折地直线发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换言之,经济波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同志“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反复告诫,从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认清经济波浪式发展的本质,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使国民经济各方面按比例协调发展。

第二,掌握世界各国经济非均衡性波动发展的特点,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共性中探寻中国经济波动增长的个性。学习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我们还可进一步认识到,经济波动不同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许多周期性波动现象,其频率、幅度和持续时间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各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求一致,中国经济增长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完全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高出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延长增长的时间。正象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那样,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的话,就有可能为今后 50 年以至 70 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我国改革开放 18 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并超越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适度发展。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要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发展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速度不宜过高,要适度。欲速则不达。人为制造的超越现实可能的高速增长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只会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建设大起大落,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人为的“大跃进”和“洋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震荡,也使国家财产遭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惨痛的教训至今历历在目,令人记忆犹新。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克服急躁冒进的思想情绪,避免极“左”错误指导方针的再次出现,让悲剧不再重演。

第四,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因此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得快一点。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个高速发展阶段。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是对我们有利的。世界上许多战略家都认为 21 世纪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地区。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良好态势将长期保持,进一步改革开放将激发出新的发展活力,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较高的积累能力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发

达国家企业以其资金、技术、品牌、管理等优势抢占国内外市场的威胁,更面临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速度,与我国争夺国际资本、争夺先进技术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正确估计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发挥优势,克服劣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

这一点对上海来说意义尤为突出。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上海自1992年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据本市的一些经济研究者预测,上海目前正处于1989—2003这一新的循环周期。1995年本应处于收缩期,而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势头不减。这并非经济规律不起作用,而是由于体制改革释放能量所致。上海经济纳入改革的主轨道始于90年代初,发展潜能较大,目前只挖掘出了1/3;同时,上海的经济增长表现为开放性增长,将国外的生产要素拿过来为我所用;此外,还缘于上海特殊的区位优势,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投资的首选地。有人估计这个增长阶段可持续10年左右,但不会改变周期的性质^⑨。因此,上海应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必须指出,这里所说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质量,讲求效益,实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⑩。

第五,经济波动不可消除,但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减少发生波动的频率,减缓波动幅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不是为了消除增长波动性,而是为了减少波动的频率,减缓波幅,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延长经济增长的上升期,保证国民经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新高峰。为此,我国应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一种能使计划、金融、财政等政府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以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调控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才能更好地引导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高宏观调控效果。

最后,邓小平同志经济波浪式发展理论还启示我们,在一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下,经济快速发展或低速发展都是正常的现象,都是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一环节。因此,当经济快速发展时,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不可骄傲自满,要未雨绸缪,认真做好向低速发展过渡的准备;而当经济处于低速度发展甚至出现低谷状态时,我们不可盲目悲观,而要增强信心,鼓足勇气,把握规律,调整结构,理顺关系,积极运作,以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去迎接新的增长期的到来。

注: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8页。

②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7页。

④⑥⑨参见《新闻报》1995年10月30日报道。

⑤有关数据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此处借用了吴玉奉“论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一文的部分观点,该文载于《投资研究》1995年第9期。

⑧参见(美)罗伯特·库特纳“商业周期并未在美国寿终正寝”,载于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2月3日。

⑩参见《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87页。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万泰国际投资学院副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